

论“人与环境相互创造”的生态意蕴及当代价值

余玉湖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要: “人创造环境, 环境创造人”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与外部自然存在相互创造、相互适应的有机统一。马克思通过分析“环境创造人”的自然基础和“人创造环境”的现实基础, 批判传统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片面性, 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条途径入手, 阐述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条件性和社会性, 说明只从“利益集团”的需要来对待自然的局限性和危害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创造关系的思想对于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课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为我们面向未来实现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探索社会与自然和谐之有效路径提供思想支点。

关键词: 人创造环境; 环境创造人; 生态意蕴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407(2016)09-216-04

Ec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Pragmatic Value Concerning Views of Crea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YU Yuhu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People creating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 creating people” implies reasonable unity among the inter-creating and inter-accommodating of human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the existing of nature. The paper elucidates necessity, condition and sociality which human beings govern na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and realistic basis of human history from denying one-sided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view of history.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and nat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Marx and Engels’s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ncerning historical issues we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providing the thinking pivot of exploring the further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and effective ways to actu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Key words: people creating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creating peopl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马克思关于“人创造环境, 环境创造人”的论断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与外部自然环境相互创造、相互适应关系的思想。“人创造环境, 环境创造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的双向关系。一方面, 人类连同自身肉体都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人类总是在继承前代已有的生产力总和基础上推进社会发展, 在能动地改造客观环境以适合自身生存的过程中, 事实上人类已经成为当代地球自然演化的主导力量, 创造了当代属人的生存环境, 所谓“人创造环境”; 另一方面, 人类生存的环境作为地球生物演化质变的产物, 人类必须借助于不断完善的工具——技术系统, 主动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 与自然界进行良性物质

变换活动, 自觉维护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 保持其自身的恢复和调节功能, 形成“良性利人”的环境, 使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否则, 产生“恶性不良”的环境使得地球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出现畸形发展, 对人类及其地球生物物种的产生和发展有重大影响, 即“环境创造人”。由此, 马克思认为: “人创造环境, 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1][92]}

1 “环境创造人”的自然基础

“人类受非人类的自然的影响, 反过来人类又影响非人类的自然。这个关系中的两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对我们理解环境问题至关重要。”^{[2][123]} 自然界的物质演化形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生态危机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XKS001); 重庆工商大学教改重点项目“新常态下高校思政课由专题教学向责任主体教学模式转变的改革研究”(2015102); 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 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新常态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进行‘四个全面’教育教学研究”(2015YJG0208)。

作者简介: 余玉湖(1977~), 江西广丰人, 博士, 硕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经济学在站博士后, 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生态哲学、经济学、科技哲学。

的客观环境,与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1]344}人类的生存状况、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自然对人类的制约既来自于天然自然固有规律的制约,又来自于人化自然规范的制约,特别是工具——技术系统完善与进步程度的制约。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形成了全球性的整体存在,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发展中构成一个整体,已构成地球自然进化的主导因素,制约着地球自然的演化,但在人类之前就存在着一个人类所依赖的早已存在的物质现实,这个早已存在的物质现实限制了人类的意识并约束着人类的行为,这形成了人类存在的物质“前提”——自然基础。

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指出人们生活、活动和繁衍后代的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客观条件’。……自然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反过来又被人类的生产所决定。”^{[3]121}人们通过社会关系实践形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是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动过程中结成的现实的人和人与人之间关系,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个人仅仅是抽象的存在物,这种抽象物因人类本质力量的缺失而在地球自然生存竞争的舞台上属于弱者,难以直接获得必须的生存资料而无法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分析“人创造环境,环境创造人”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的原因,批判了近代唯物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指出了他们在这方面所持的观点:一是脱离了自然的历史发展观,把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凝固化、片面化。从时间维度上只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更替,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征服和改造自然而取得的伟大胜利”;从空间维度上认识到这一伟大胜利是使“自在自然”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过程。二是分离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论,使两者对立化、孤立化。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自然观割裂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联系,甚至把自然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排除出去,没有认识到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重要认识论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从历史观和认识论两条途径入手,提出克服脱离日常生活、脱离自然界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片面性的途径,以最终把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片面理解的静止自然、抽象的人统一到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之中。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不但为人类提供基本的生存资料,为人类社会提供丰富多样的物质基础,而且通过这些生存资料制约着和作用于“人自身的自然”。因此,自然界是人类历史发展前提条件和自然基础。

但自然界不会为人类提供现成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人

类必须通过生产实践来获得所需要的生存资料,这也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原因,“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67}人类现实的自然界是通过人类劳动打上人的印记所形成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现实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仍然具有对人类历史的优先地位,但是这个自然界已经不是原始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是人通过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创造形成的现存感性世界,是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改造过的自然界,如果孤立或对立现存感性世界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无法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与自然的现实统一性出发,既批评了传统历史观把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片面性,也批评了脱离日常生活、脱离历史发展的纯粹自然主义观,实现“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人”的有机统一。

2 “人创造环境”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立场贯彻到历史领域,从社会历史发展中考察人类现实的自然界,在现实自然运动的基础上考察人类社会实践,奠定了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但被该现实基础所限制和约束的人类活动,反过来也深刻地改变了这个现实基础。这个现实基础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然而,人们对自然的理解而形成的自然观与不同时期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可以从人的生存方式来理解自然,为自然赋义;也可以从对自然解密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人类生存,并且通过许多协调活动来展现出不同民族、区域和时代与环境相协调的不同方式和传统,这种协调活动的方式和传统往往体现在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条件性和社会历史性。当然,我们今天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支配自然”的含义时,不能单纯地站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认为人类带着纯粹目的去奴役自然,把自然当成被掠夺和挥霍的对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瑞尼尔·格伦德曼也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支配(domination)”并不意味着征服与破坏,相反,这正是缺乏支配的表现,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集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这是实质上的服务而不是破坏。他甚至提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范围广能力越高就越自由^{[4]57-61}。

2.1 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

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进化过程的质变产物,在与生态系统的联系中产生了具有新质的两个结果,使其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支配自然的必要性体现在人类生存于地球自然

之上,为了人的需要和利益而干预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与繁衍所必须的,显然,这种合目的性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自然的支配”以及持有这种观念与“支配自然”以及实际上能否支配自然并非同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从积极的方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支配与利用,而且马克思强调的“支配”和“统治”自然,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维护自然整体有机系统基础上,蕴含着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加工与改造作用必然要、必然性的理解。然而,如果无限夸大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性,无条件地把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那么,将导致人们在观念上藐视外部自然,在实践中违背客观规律,最终使得人类在实践中对自然的支配失去其合理性。

“支配自然”的观念前人早已有之,强化这种观念并转化为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实践则是由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变革造成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而强化,为人类支配自然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不仅在行动上是一个过程的强化,而且在观念上和思想上也都进行着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论证。”^[53]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论把宇宙变成了以人为中心,人被赋予了统治、征服自然的权利,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一切都以人为尺度,通过人与上帝之约而获得的上帝赋予的权力,由此符合逻辑地推导出人统治自然的必然性并付诸实践。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对于人类认识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有积极进步作用,但人类以此为豪,凭借自身日益强大的工具技术系统征服、奴役自然,并且盲目乐观认为取得了征服自然的伟大胜利,近年来,却遭受自然界连续不断的报复,反思当今的日益严峻生态环境问题,与这种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

2.2 人类支配自然的条件性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建立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是有条件的,是基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人类“支配自然”的自由是建立在认识自然的前提之上,“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6]455~456}人类只有在尊重自然规律的条件下,认识“必然王国”,才能逐步迈向“自由王国”。

随着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发展,人类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与支配”。恩格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发生为背景,说明了人如果能够“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确实可以“支配”和“控制”自然。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深化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取得了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一系列辉煌成就。人类通过大规模开发矿山获取资源,制造机器扩大生产,开挖运河便利航

运,垦殖荒野拓展耕地,引水灌溉滋润土地。但是,人类通过工具技术系统取得“控制与支配”自然的总是有限的,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相对来讲,人类支配自然的又是暂时的,从整体上看,人类控制自然的也是局部的,因此,人类很难完全预知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动中会发生的一切,因此,人类应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取得“支配”自然更多的条件,建构人类生存和发展可持续性现实基础。

2.3 人类支配自然活动的社会性

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必须通过结合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才能实现,他们分析了相应的社会条件对于支配自然的重要性。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考察了亚洲国家政府对于外部自然条件的控制状况及其影响时指出,在古代亚洲的许多国家一般都有三个基本的政府部门:一是对内的财政部门;二是对外的军事部门;三是为对内和对外服务的公共管理部门。这些部门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服务的,但除了对内和对外的部门直接体现阶级意志外,作为公共管理部门承担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职能。在农耕社会,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对环境、土地和资源等进行支配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集中体现在发展农业,修建水渠等公共设施的管理和服务上。公共管理部门通过举办公共工程,履行经济职能,改造自然环境,使之对人类服务,使人在荒无人烟的环境下能有效生存,逐步形成人类文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人类支配自然的体现。

马克思很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支配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支配自然的实质在于对自然进行有效的管理;人类社会的文明基础正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性基础上,通过相应的社会管理机构,在实施社会职能过程中,合理、合法地对自然资源有效支配,使资源得以合理使用,使生态自系统循环发展,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3 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

首先,“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的有机统一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理解,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在自然环境生态领域的运用和体现,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方法提供重要启示。泰德·本顿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天然地被认为可作为一个理解人类自然和历史的生态学方法。”^{[7]55}这对于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体现于人类生存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和自然作用于人类的因果性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未来社会设计的理论前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理解,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但

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而且把自然的观念纳入社会历史范畴去理解,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整体性存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8]54~55}。

其次,“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中包含着“支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对于如何“支配和统治”自然,更好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方法和借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入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是建立在现有生产方式基础上对自然进行能动加工改造而形成的,人类现实的生存环境正是人类对自然支配的结果,但这种支配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必要性和社会性基础上的,而不是盲目的,否则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自然报复”的原因:一方面,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宇宙演化发展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往往难以预见到人类行为对自然造成的“往后和再往后”的“结果”,或“较远的自然后果”;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对于“支配自然”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是从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把自然作为资源或免费品来利用,仅仅依据“利益集团”的需要来对待自然,忽视了“支配自然”带来的系列后果,对“征服自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认识不足,补给和补偿不到位,使自然失去其自身调节和恢复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实践的发展,当代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演绎出自然报复的事实,足以警醒世人:不能只从人类“利益”角度或只从人类眼前利益考虑去对待自然,把自然当作单面的,单向度的关系,人类应该逐步深入对自然的认识,从更加公平、公正、公益角度与自然建立多面的、和谐、丰富的关系,夯实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

最后,“人创造环境与环境创造人”为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能动与约束”共存的路径提供重要启示。人类发展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人本身,“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己——是它自然的本质。”^[9]“人创造环境”的能动作用依然受这种作用运行于其中的环境的限制和约束,并依赖于外部现实。这启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形成人化自然和现实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也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然而,随着工具——技术系统的日趋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超过其自身的承载力,甚至在“理性万能”的指引下,疯狂开采和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生物多样性损失、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土地污染和恶化;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废弃物储藏泛滥、供给损耗严重、自然资源耗竭、生态体系功能丧失,形成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

工具——技术系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人们的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进行普遍交往活动中,在交往实践中实现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来保持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平衡方式是历史的必然。实现这一转变,强大的人类应该对脆弱的自然给予关怀。我们不仅要发展工具——技术系统,强化这一物质技术基础,我们更要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环境相互创造和制约的观点出发,通过人类集体的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层面的剥削将会消灭,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也将消失,真正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解”,一方面良好的环境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创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人的素质提高,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会创造更加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创造环境,环境创造人”的思想对于我们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发展了一门目前所需的对环境问题进行适当理解的科学的作者。”^[10]为我们面向未来探索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有效路径提供思想支点。☑

致谢:本文得到陈耀成老师的指导,并吸收了陈老师的观点,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3]Parsons H L.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77.
- [4]Grundmann R. Marxism and ecolog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5][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Benton T.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J]. New Left Review, 1989, 178: 70-107.
- [8]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M].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
- [9]Parsons H L.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ecology: Contributions in philosophy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77.
- [10]Dickens P. Society and nature: Towards a green social theory [M].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责任编辑:国怀亮)